

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 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

陶 然¹ 孔德华¹ 曹广忠²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农村到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特别是研究了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个体、家庭和城市因素。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的性别和年龄、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流动人口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的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未观测到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 就学地 户籍制度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①。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模式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那种以永久性、家庭迁移为主导的模式，而多表现为人口临时性、单身、钟摆式迁移。流动人口在城乡间的往返式流动，不仅带来了每年春运时巨大的交通压力和移动成本，也让不少流动人口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无法有效监护子女以及照顾老人之苦。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②，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加。但是，由于诸多条件，包括收入、住房、城市教育政策等多方面的限制，目前，仍有很多流动人口因无力解决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就学问题而只能选择让子女留在农村。根据2008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③，2005年，中国有约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其中，父母一方外出的约2734万，父母双方外出的约3066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开始从单身外出逐渐转变为家庭迁徙，因此形成的流动儿童群体规模也随之扩大（邱小健，2009）。《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0》^④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算出当年0～

*本文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制度与相关社会保障研究”（项目编号：70633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战略中的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项目编号：08-ZD025）、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①本文中，“农村流动人口”或“流动人口”特指“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且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

^②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0》，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chinapop.gov.cn>），2010年6月26日。

^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妇女网（<http://www.women.org.cn>），2008年2月27日。

^④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7岁的跨县（市、区）从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流动儿童约为1212万。

在城市化过程中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构成了突出的挑战，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从流动儿童看，虽然有些城市开始逐渐放开公办学校入学，但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仍然存在不小困难，相当部分流动儿童不得不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而后者往往具有流动性、边缘性和不规范性，在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上比较落后，因此，这些流动儿童无法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韩嘉玲，2002）。从留守儿童看，虽然他们在老家上学，教育公平性问题并不严重，但大多数留守儿童正处于情感、人格发育方面的变化转折期，长期与父母分离且往往由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照看，缺少父母直接的亲情关怀和学习监督，很容易受到消极情绪困扰，容易变得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出任性、暴躁或极端的性格，学习动力不足，没有成就感，学习成绩一般，易染上吸烟喝酒、迷恋上网、打架闹事等不良习惯（林宏，2003；彭大鹏、赵俊清，2005）。

虽然学术界就城市化过程中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但要研究中国为数众多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在目前城乡二元体制和相应的教育体系下，哪些流动人口家庭会选择让孩子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哪些会选择让孩子留守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名学龄儿童，父母在决定让其中一个或多个孩子流动到城市或留守农村时考虑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换句话说，流动人口家庭在做出上述决策时会受到哪些孩子个体、家庭因素以及流动人口迁出地、迁入地特点的影响？

本文将基于一次大样本调查的数据来考察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因素。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有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文献，指出目前研究有待完善的方向。第三部分介绍调查抽样方法，并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考察与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相关的主要典型性事实及其基本特点。第四部分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主要因素，并分析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之差别。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既有关于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留守儿童在农村与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一些研究还对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程度进行了比较。比如，王水珍、刘成斌（2007）比较了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具体从教育社会化、生活社会化、身心健康社会化、人际关系社会化、知识广度与他人评价五个维度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总体社会化效果要优于留守儿童。因此，他们认为，选择让子女与父母一起流动将更有益于流动人口子女的健康发展。范兴华、方晓义（2009）则从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多个维度，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一般儿童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性明显高于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双留守儿童。其含义是，为增强孩子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家庭应将孩子带到打工城市生活。

如果既有研究能证实流动儿童的社会化程度优于留守儿童，政策上就有理由支持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到打工城市上学。但是，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还需进一步考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影响因素，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即使从社会化程度看流动儿童要优于留守儿童，但由于户籍、教育质量、家庭收入和未来预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并非所有流动人口都希望或有能力带子女到打工城市上学。实际上，每个家庭、孩子、流动人口迁出地和迁入地都有其特点，而这些特点都会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的选择。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些影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地点选择的因素，并

分析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既有文献中，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问题的研究还相当少。一个例外是许召元（2008）的研究。他利用“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第二期）”2006年11月～2007年4月进行的对北京、广州、南京、兰州和安徽亳州4000多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调查的数据，考察了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工作稳定性越高，越倾向于让其子女到打工城市上学；夫妻双方同时外出打工的家庭更倾向于带子女到打工城市上学；打工城市特点对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例如，以亳州为对照组，在北京、南京、兰州打工的农民工，其子女到城市上学的概率更高；此外，农民工从事采矿业和建筑业对其子女进城上学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这些行业的高危性或高流动性所致。

虽然上述研究在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因素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抽样地点覆盖面以及回归模型设定、变量选取等方面仍有待完善之处。本文将基于一组覆盖面更广、也更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综合考虑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因素，例如子女性别和年龄、子女祖父母是否健在、家庭收入水平、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老家农村学校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政策等，并对不同家庭类型进行区分，以便全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因素。

三、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基本事实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在2009年进行的中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城市大样本流动人口调查。这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地区，课题组在每个地区抽取三个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大中城市、中小城镇），然后利用各地外来流动人口登记计算机系统，对外来流动人口进行等距随机抽样。调查对象为在每个城市随机选取的200个流动人口。调查收集了流动人口个人与家庭情况，包括就业情况、劳动合同情况、城市居住情况、子女教育情况多个方面。由于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往往很大，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抽样难度过大，因此，在人口超过100万的特大城市，课题组一般只选取一个下辖区进行调查。对于四个特大城市，最后确定的调查区域是广东广州市白云区、重庆九龙坡区、浙江宁波市江北区、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对大中城市和中小城镇，课题组则选取城市（或城镇）所在地下辖所有城区进行调查，抽样地点包括珠三角的广东中山市、东莞市茶山镇，长三角的江苏江阴市、浙江乐清市，环渤海的山东潍坊市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镇，成渝地区的四川南充市和成都市温江区。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大，通过计算机系统抽样抽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已流动到他地。在这种情况下，课题组一般根据等距原则继续抽样，直到抽取到预定样本数。

调查获得有效问卷2397份，被访流动人口来源地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来源超过100人的省份有四川（611）、山东（293）、安徽（164）、河南（160）、湖北（143）、湖南（133）、广东（127）、江苏（123）和江西（118）。被访者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户籍类型看，被访者绝大部分为农业户籍人口。从性别看，被访者中男性占多数。从年龄构成看，被访者主要集中在21～40岁之间。从受教育水平看，被访者中初中水平者相对居多，小学及以下水平者和高中水平者比例相当，而高中以上水平者相对较少。从婚姻状况看，已婚人口占多数。从流动时间看，流动1年以内者、2～5年者、6～10年者和10年以上者比例大体均匀，其中，流动时间2～5年者相对较多。

调查数据显示，31.54%的被访者（756位）家庭有1990～2004年出生的适龄入学子女963位，其中，上过学和正在上学的有942位，入学率为97.82%。2009年仍在上学的流动人口子女有873位，通过询问“孩子在哪里上学”，课题组能有效确定上学地点的流动人口子女有864位。其中，479位在老家上学，385位随父母在打工城市上学，城市就学比例为44.56%。

表1 样本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

变量	频数	比例 (%)	变量	频数	比例 (%)
性别			受教育水平		
男	1343	56.08	小学及以下 (≤6 年)	528	22.05
女	1052	43.92	初中 (6~9 年)	1039	43.38
年龄			高中 (9~12 年)	571	23.84
11~20 岁	275	11.48	高中以上 (≥12 年)	257	10.73
21~40 岁	1627	68.94	户籍类型		
41 岁以上	494	20.68	农业	1954	81.59
婚姻状况			非农业	441	18.41
未婚	853	35.63	流动时间		
已婚	1494	62.41	1 年以内	417	17.86
离异	30	1.25	2~5 年	728	31.19
丧偶	17	0.71	6~10 年	577	24.72
			10 年以上	612	26.23

注：因为个别样本的调查内容存在缺省项，各组频数之和小于有效样本总量；各级的比例为有效百分比。

在所有流动人口子女中，来自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且可以确定信息有效的适龄入学习子女有725位。其中，414位在老家农村上学，311位随父母到打工城市上学，城市就学比例为42.89%；在打工城市上学的流动人口子女中，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有199位，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的有65位，就读于高档私立学校的有11位，其余在其他类型学校就读。此外，还有119位孩子来自其他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其中有52.94%随父母到打工城市上学，这个比例比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城市就学比例约高10个百分点。

本文后面的分析只针对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子女。与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相比，由于农村教学条件较差，教育资源较少，教学设施不健全，教育问题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而言更为突出。

在考察“孩子在哪里上学”后，课题组还进一步询问了“孩子为什么放在老家上学”或“孩子为什么在城市上学”。从表2可知，把子女放在老家上学的农村流动人口中选择“城市上学费用更高”的比例高达70.29%，选择“在城市打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比例为36.96%，选择“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学校”的比例为27.54%。从“城市上学费用更高”可推断家庭收入可能会影响到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从“在城市打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也可推断流动人口工作类型（是否自我雇佣）也会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

表2 农村流动人口把孩子放在老家上学的原因

原因	个数 (人)	百分比 (%)	原因	个数 (人)	百分比 (%)
城市上学费用更高	291	70.29	孩子的学习水平跟不上城市学校的要求	22	5.31
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学校	114	27.54	孩子更愿意在老家上学	37	8.94
在城市打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153	36.96	其他原因	49	11.84
孩子来城市学校会受歧视	16	3.86			

注：问题答案可多选。

表3给出了农村流动人口把孩子带到城市上学的原因。选择“在身边念书自己可以更好地照顾孩

子”的被访者比例高达79.10%；选择“城市的教育质量更高”的比例为34.73%；选择“老家找不到合适的人照顾孩子”的比例为18.97%。由此可知，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将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是出于更好照顾孩子、同时保持家庭完整亲情联系的考虑；而选择“老家找不到合适的人照顾孩子”则反映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作为孩子监护人的重要性，他们通常是照顾留守儿童的首要人选。

表3 农村流动人口把孩子带到城市上学的原因

原因	个数 (人)	百分比 (%)	原因	个数 (人)	百分比 (%)
城市的教育质量更高	108	34.73	孩子更愿意来城市读书	13	4.18
在身边念书自己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	246	79.10	其他原因	7	2.25
老家找不到合适的人照顾孩子	59	18.97			

注：问题答案可多选。

四、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实证分析

学校教育是流动人口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关系到孩子身心健康和未来职业选择，而且关系到流动人口自身工作、生活乃至养老问题。而子女就学地选择是流动人口必须要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在选择让孩子在老家农村还是打工城市学校就读时，流动人口必然考虑家庭情况、孩子情况、自身工作性质和收入状况以及老家和流入地城市教育政策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决策。

（一）可能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类：流动人口及其子女个体因素、家庭层面因素、流入地及流出地的政策因素。其中，流动人口及其子女个体因素包括子女性别、子女年龄、子女在家中排行，流动人口本人受教育年限、年龄、工作类型、潜在监护人（例如孩子祖父母）是否健在，以及一些反映流动人口工作稳定性的变量；家庭层面因素包括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孩子数目；政策因素则主要考虑老家学校对留守儿童是否有优惠政策、城市公办学校是否收取择校费和（或）借读费等。

首先，流动人口及其子女个体因素可能会影响其就学地选择。比如，重男轻女观念可能让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带男孩去打工城市上学。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高考和录取情况的省际差异也使孩子年龄对其就学地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若流动人口希望其子女未来接受高等教育，在老家接受高中教育可能更有利，特别是考虑到年龄大的孩子其自理能力一般更好，则其子女留守老家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就更大。子女在家中排行会影响其就学地选择，其原因除父母可能更愿意自己照顾排行较小的孩子外，另一个原因是排行较小的孩子可能是超生的，为逃避计划生育处罚，父母将其带到打工城市上学。以双子女家庭为例，本文研究显示，流动人口的第二个男孩在打工城市上学的比例比第一个男孩高4个百分点，第二个女孩在打工城市上学的比例比第一个女孩高14个百分点。子女就学地选择决策还会受流动人口工作类型的影响。例如，自我雇佣者更容易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更有可能自己照顾孩子，也就更可能把孩子带到打工城市。流动人口父母健在则为留守儿童提供了可靠的监护人。流动人口工作稳定性的提高也有助于其子女到城市就学，否则流动人口工作（职位或地点）经常变动，其子女就不得不频繁更换学校。

其次，家庭层面因素会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家庭人均年收入绝对量和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这两个指标，是考虑到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就越有资金支持子女教育。由于城市学校尤其是城市公办学校教育水平往往比农村学校高，加上流动人口能够直接监督孩

子，因此，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将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收入中主要来自城市打工的现金收入，该比例的提高应有助于流动人口把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

再次，政策因素也会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影响。流出地老家和流入地城市的教育政策会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有关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入学具有一定限制性，到现在要求城市公办学校给予流动儿童同等待遇，中国教育政策在最近十多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结果是流动人口子女到其父母打工城市上学的比例也逐渐增加。无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都日益得到政府重视。一些人口迁出地农村的学校为留守儿童提供专门住所和心理辅导，使农村外出人口更放心地把子女放在老家上学。与此同时，城市不收取择校费和借读费也可减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上学的成本。在调查问卷中，课题组搜集了被访者流出地老家农村学校是否提供了“寄宿”、“校车”、“额外的课程辅导”、“心理咨询”、“老师担任代理家长”等优惠政策的信息，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有助于留守儿童生活、学习、身心健康或加强对其行为的引导和监督。课题组还根据城市公办学校是否收取借读费或择校费定义了城市教育政策变量，设置该变量时综合参照了课题组进行的农民工子女城市教育情况调查和各样本市颁布的教育政策。其中，收取借读费或择校费的地方有东莞市茶山镇、广州市白云区、三河市燕郊镇、宁波市江北区、潍坊市、乐清市、中山市、重庆九龙坡区，不收取借读费和择校费的地方有济南市历城区、成都市温江区、南充市、江阴市。

（二）计量分析

本文中研究中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地，即流出地农村或流入地城市。若在老家农村上学，取值为0；若在父母打工城市上学，则取值为1。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分析。对于模型本文不再赘述。表4给出了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 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子女性别（女性=1）	725	0.4359	0.4962	0	1
子女年龄（岁）	725	11.564	3.8901	5	19
子女排行	725	1.3738	0.8123	0	3
被访者受教育年限（年）	725	6.9386	3.0933	0	16
被访者年龄	725	36.7410	5.0606	26	62
被访者工作类型（自我雇佣者=1）	713	0.3815	0.4861	0	1
被访者 2004 年以来非农工作数	711	1.8101	1.4753	0	15
孩子祖父母是否健在（是=1）	720	0.8694	0.3371	0	1
家庭人均年收入（原始数据单位为元，取自然对数）	725	9.0098	0.6361	6.44	11.99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725	0.9059	0.1497	0	1
家庭孩子数目	725	1.7448	0.6729	1	4
老家教育政策（有优惠政策=1）	725	0.0262	0.1599	0	1
城市教育政策（有收费政策=1）	725	0.6924	0.4618	0	1

从表4可以看出，样本中43.59%的孩子为女孩，孩子平均年龄在11.6岁左右，家庭最多有4个孩子。被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从0~16年不等，平均6.9年。被访者平均年龄从26~62岁不等，平均年龄36.7岁。38.15%的被访者为自我雇佣者。被访者2004年以来从事的非农工作个数从0~15个不等，

平均1.81个。孩子祖父母健在的受访者占86.94%，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值10360元，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达到90.6%。从政策方面看，仅2.62%的留守儿童享受到老家农村学校的优惠教育政策。

表5列出了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其中，回归（1）中仅包括流动人口及其子女个体特征变量，回归（2）中加入了家庭特征变量，回归（3）中包含了所有解释变量。从回归果看，子女性别和年龄、受访者本人工作类型、子女祖父母是否健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收费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尚未发现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工作稳定性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有显著影响。

表5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子女性别	-0.233 ^{**} (0.099)	-0.210 ^{**} (0.103)	-0.212 ^{**} (-2.040)
子女年龄	-0.072 ^{***} (0.017)	-0.067 ^{***} (0.017)	-0.066 ^{***} (0.019)
子女排行	-0.112 (0.112)	-0.001 (0.131)	-0.010 (0.132)
受访者教育年限	-0.018 (0.016)	-0.027 (0.017)	-0.030 [*] (0.017)
受访者年龄	0.024 [*] (0.014)	0.020 (0.014)	0.016 (0.014)
受访者工作类型	0.524 ^{***} (0.102)	0.511 ^{***} (0.108)	0.454 ^{***} (0.108)
受访者 2004 年以来非农工作数	-0.046 (0.037)	-0.050 (0.039)	-0.045 (0.040)
子女祖父母是否健在	-0.358 ^{**} (0.153)	-0.293 [*] (0.154)	-0.281 [*] (0.152)
家庭人均年收入	—	0.086 (0.082)	0.0751 (0.082)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	1.768 ^{***} (0.377)	1.882 ^{***} (0.351)
家庭孩子数目	—	-0.165 [*] (0.095)	-0.106 (0.097)
老家教育政策	—	—	-0.492 (0.377)
城市教育政策	—	—	-0.330 ^{***} (0.012)
样本数	697	697	697
Wald 检验 χ^2 值	60.26	80.93	88.93
Pseudo R ²	0.064	0.091	0.103

注：①括号里是稳健标准误；②*、**和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被父母带到打工城市上学，说明流动人口仍可能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孩子越小越容易被父母带到打工城市上学，也验证了影响因素分析中的猜测；受访者若为自我雇佣者，则更可能将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孩子祖父母健在为留守子女提供了可靠的监护人，降低了孩子到父母打工城市上学的可能性；流动人口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大，其子女越有可能被带到打工城市上学；城市公办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收取择校费或借读费则会降低流动人口把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的可能性。本文研究发现与许召元（2008）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比如，本文研究未观测到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收入、工作稳定性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利用孩子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户口类型、工作类型和工作稳定性指标代替受访者相关变量进行了回归，来进一步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子女性别和年龄、流动人口工作类型、流动人口子女祖父母是否健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城市公办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收取择校费或借读费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影响与前面回归结果相同。本文研究还发现，母亲年龄越大越有可能把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本文还利用“从事非农工作以来受访者平均每年更换省份数的最小值”来代表流动人口的工作稳定性，其回归结果非常显著。

最后,本文利用Probit模型分别对流动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这两种家庭类型的子女就学地选择进行了回归,发现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相对而言更容易受到歧视。限于篇幅,上述回归结果没有详细列出。

五、结论

基于2009年12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正在上学并可以确定就学地点的适龄入学流动人口子女有864位,其城市就学比例达到44.76%。其中,来自农村且信息有效的流动人口子女有725位,其城市就学比例达到42.89%。这一比例说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带子女进城入学。相当部分农村流动人口认为,不仅在身边念书自己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而且城市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高,对子女未来成长更为有利。当然,仍然有超过半数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在老家,这主要是因为在城市上学费用高,且流动人口在城市打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此外,“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学校”是流动人口把子女放在老家上学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本文研究对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因素的考察表明,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被父母带到打工城市上学;孩子年龄越小,越容易跟随父母到打工城市上学;被访者的工作类型若是自我雇佣类,也更有可能会将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控制收入水平后,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越大,流动人口越有可能把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城市公办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收取择校费或借读费会降低流动人口把子女带到打工城市上学的可能性。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研究没有发现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平均收入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关系到这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人力资本积累,还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发展潜力。如果其子女得不到好的教育机会,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并让贫富差距表现出代际传递。本文研究还表明,农村流动人口可能更倾向于让女孩留在农村,这对女孩的教育及其未来发展很可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在公共政策中进行有选择性的干预,是值得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总体来看,未来政府政策改革的取向,是不仅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打开城市公办学校的大门,还应该同时创造条件实现更多的流动人口举家迁移。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的一些政策措施,可能要超越教育政策本身。比如,如果城市无法为流动人口提供支付得起的住房,那么,即使城市公办学校的大门打开了,流动人口实现举家迁移仍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通过城市土地制度、住房体制等多方面改革为流动人口举家永久性迁移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村孩子随进城打工的父母进入城市定居并顺利在城市公办学校就学,是中国未来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要处理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 1.邱小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8期。
 - 2.许召元:《农民工子女就学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6期。
 - 3.韩嘉玲:《关于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以北京市为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 4.林宏:《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现状的调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 5.彭大鹏、赵俊清:《农村“留守子女”问题之社会和政策因素简析》,《基础教育参考》2005年第1期。
 - 6.王水珍、刘成斌:《流动与留守——从社会化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选择》,《青年研究》2007年第1期。
 - 7.范兴华、方晓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 (作者单位: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责任编辑:小林)